

DOI: 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8.03.004

全面现代化与经济发展优势

刘伟¹, 蔡志洲², 李心愉³

(1.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2. 北京大学 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3.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文章对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优势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高速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说明了新时代经济增长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积极发挥基础性作用。在这一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在新时代全面现代化进程中的比较优势,说明了中国新时代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有现实的发展基础。

[关键词]改革开放; 现代化; 经济增长; 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8)03-0020-06

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分两阶段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从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之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我们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后,重新开启的一个新的历程。从可比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中国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即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时,大体上接近于经济发展史上从上中等收入(2010年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起点”水平)跨入当代高收入阶段的起点,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实际上将以往所说的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间表提前了15年;而达到第二个百年目标,则意味着本世纪中叶赶上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通常所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1](P.29)}

一、从高速经济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了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长远规划和时间表,但没有再像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从十二大到十八大)那样,提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目标。这一方面是因为通过长期的市场化改革,我国微观领域的自我发展机制培育起来之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已经建立起来,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或者是决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和全社会对全面发展已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已经不能反映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全面的、高质量的

[收稿日期]2018-02-13

[作者简介]刘伟,男,中国人民大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志洲,男,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李心愉,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发展就成为新时代发展的特征。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更不能等同于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发展”具有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涵。就经济发展而言,要更多地关注发展的质量、发展的效率、发展的方式、发展的结构、发展的目的等多方面内容,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社会发展而言,则关注的方面就更为广泛,正如我们党所概括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所提出的发展要求。但是,不以GDP增长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放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要求,也不意味着放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P.35)},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PP.30-31)}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有机统一。“以人民为中心”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由党的宗旨、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规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发展的基本方略,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基本矛盾规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1]

“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有机统一,并不是不要经济增长,而是要把经济增长放入“五位一体”的整体框架中,发挥好经济增长在全面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不能只是“为增长而增长”。从概念上看,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或使用的货物和服务的总和,而经济增长则是按可比价格反映的这种总和动态对比的结果。货物和服务的总量大,增长得快,为社会和居民提供的福利也就可能更多。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增长率越高,高增长持续的时间越长也就越好。但是GDP是一个总量指标,只用一个指标来反映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状态肯定是有局限性的。首先,从计价的方法上看,GDP统计中公共服务有特殊的定价(如政府服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等在很多情况下只按照从业人员的收入来计算),在这样的统计处理

后,公共服务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肯定是被低估的,如果单纯以GDP为导向,那么公共服务的发展就可能不被重视,而能够形成较高增加值的行业就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这导致对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行业的发展可能受到影响;其次,从生产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看,GDP核算的主要是进入市场的商品或服务,但未进入市场的资源和环境尤其是环境的变化不在GDP的核算范围内,联合国为了解决和改善这一难题已经在建立绿色国民核算体系,但是到目前为止,GDP核算中如何扣除由于资源环境的恶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第三,从总量和结构的关系上看,GDP主要反映总量,虽然国民经济核算中也提供了GDP中的各种分量的计量,如对增加值结构、收入支出行为、最终需求、国际收支、通货膨胀等的计量,但就总体而言,人们更关心的还是GDP的总量而不是结构,尤其是在地区之间、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时更是如此。在结构失衡时,较高的GDP或者是人均GDP并不一定能提供更多的福利,或者说,同样的GDP或人均GDP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下(尤其是在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下)所提供社会的福利有可能不同。所以,从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看,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的支持,但反过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经济增长。而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有社会发展、资源和环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方面协调发展的要求也就越复杂。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能只反映在GDP上,还要反映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上。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论述实际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做出了新的判断,这就是经过中国人民上百年的努力,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奋斗,中国已经总体上不再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但是经济社会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还需要在发展中不断改善。这实际上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在总量上要实现持续增长不断充实的要求,还需要在生产结构、分配结构和产出结构上实现均衡发展,服务于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经济社会环境等全面发展的要求。

因此,全面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相

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增长必须为全面现代化建设服务,而全面现代化建设则会极大地带动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国,都有较高的人均 GDP,与此同时,在教育、科学、社会和环境等方面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在我国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前期,由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很低,我们必须以经济增长为突破口,带动经济发展和其它方面的建设,在这一阶段加速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增加投入,尤其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并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强化竞争,以促进和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即人均 GDP 提高到一定水平时,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是全面发展,这种发展有时看上去要牺牲一点经济增长率,但从长远看,实质上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而从供给侧看,实现经济增长则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增加投入。我国目前所经历的,正是这种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所出现的转折,即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折。从横向比较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78 年中国的 GDP 总量为 1495 亿美元,约为美国的 6.3%;而到了 2016 年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了 11.2 万亿美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美国的 60.3%。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现在的 GDP 已经达到美国 1978 年水平的两倍以上,大约相当于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水平。从纵向比较上看,中国 2017 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 80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为 1978 年的 34.5 倍,年均增长率为 9.5%,持续地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使中国经济每年创造的增量越来越大。2016 年,中国按汇率法计算的 GDP 已经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 15% 左右,已经走进了全球经济舞台的中央,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折,不仅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全面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二、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标准,就是在各项发展上要赶上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是在不断提升的,所以现代化的标

准也在不断提升。而我们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就应该有更好更快的发展,这样才能使我们最终实现全面赶超的目标。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看,2017 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 GNI)或者是人均 GDP 都已经达到了 9000 美元的水平,比 2010 年中国刚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时的水平(4340 美元)翻了一番,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较高水平(2016 年为 3956~12235 美元)。从我国目前的三个阶段性发展目标而言,到 2020 年前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实现建党 100 年发展目标时,将可能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标准的下限(即 12000 美元左右),这将使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进入一个全新的起点。而到了 2035 年和 2050 年,我国将要基本实现和全面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上(表现在人均 GNI 上)要比 2020 年前后有一个巨大的提升,达到高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平。

那么在全面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是否还有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动力,让我们能够以更快更好的发展来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韩国,没有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经济增长中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约束条件也很多,但仍然保持了持续的较好的经济增长。美国一直保持着世界头等强国的地位,韩国则在“亚洲四小龙”中的其它经济体放慢了增长脚步的时候,仍然通过科技创新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保持着持续增长。反过来,也有一些看似条件比较好的国家,也希望加速经济增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俄罗斯联邦和委内瑞拉,但由于其产业政策和经济体制都有问题,最后从高收入国家又退回到上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中国来说,与处于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的国家及与一般高收入国家相比,我们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的优势至少有五方面的优势,即制度优势、创新优势、发展优势、大国优势和文化及传统优势。

第一是制度优势。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甚至是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时,经济发展就开始出现停滞。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一般地说,都存在着政府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市场失灵的现象,原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体制反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桎梏。但中国的面貌则完全不

同。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100年的奋斗目标之际,党和国家深化改革、从严治党治国和清除腐败,形成了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治局面。在经济上,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建立起来,首先是经过产权制度的改造,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并且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进一步推进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造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使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以价格为引导的配置市场资源的现代经济体系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市场、土地市场等建立和发展了起来。虽然这些市场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但从总体而言,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活力和最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中国奇迹”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创造出来的,而且会继续延续。党的十九大以后,党和政府进一步强调发展现代经济体系对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这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克服“贫困的陷阱”,实现持续发展,从低收入的贫困状态实现温饱(1998年),进而又跨越温饱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率从10.2%降至4%,重要的就是依靠制度优势,依靠改革开放产生的制度创新红利。这种制度红利既不是沿袭传统经济体制,又不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而是切实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总结经济发展史上“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存在,“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之所以发生,其原因在于发展理念的偏差,发展脱离了科学、和谐、均衡,脱离了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之所以发生这种脱离,原因在于其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与解放发展生产力要求的矛盾和对立,在于其经济体制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失灵导致其在资源配置上难以真正发挥决定性硬约束作用,政府失效导致其在市场失灵的短板领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失灵同时政府失效,政府集权同时市场化不足,导致政府集权下发生“寻租”的可能性极高,企业难以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资源,只能通过“劝说”政府获得机会;在经济机制失灵的基础上法治化更加滞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法治经济、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制度

和治理结构难以形成,对私权缺乏保护,对公权缺乏规范,进而使权钱交易的“寻租”可能成为严重的现实,资源配置不是遵循市场公平竞争下的效率原则,而是普遍遵循寻租过程中的“腐败强度”,既无公平又无效率。要实现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必须依靠有效有力的政治力量组织和领导,政治治理结构具有突出的意义,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最薄弱的恰在于此。因而,我们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实现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是创新优势。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在制度优势中已经讨论过,这里说的主要是技术创新。从世界经济的历史看,技术创新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只是加大投入而没有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再加上国家这些年来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目前的技术创新正处于最好的发展阶段。多年的人才队伍的培养,科技的“引进、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发展及支持,目前中国在全球化科技发展中已经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大科技创新中心,尤其是在互联网经济、计算机和智能手机、高铁、航天航空、生物科技、新能源发展等一系列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优势或正在取得优势,其规模和发展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许多发达国家,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这当然也是中国发展不平衡的一种表现,就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的发展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国家和市场仍然鼓励一些尖端领域的发展,由此形成突破并存在示范效应,带动其它领域的发展。但这种局部的超常发展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在短期牺牲部分公平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效率,从长远上则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的福利。科技创新在历史上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使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增长似乎已经走到极限时又找到新的突破口。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从未来的发展看,中国的经济体量将会达到一个现在难以想象的规模,仅仅就对能源的依赖而言,如果在符合全球共同的环境保护要求的新能源发展上没有重大突破,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持续。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这种突破。中国的崛起发生在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在这一浪潮中,我们进行了改革开放,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从而把握好了重点,抓住了有利时机,在这一领域率先实现了赶超,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这为我们实现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是发展优势。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经到达了相当大的规模,自GDP总量超过日本后,商品进出口总额、制造业增加值总额等又先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最有经济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从人均国民收入上看,和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仍然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高收入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大约在4万美元左右,为中国人均水平的四至五倍。这种差距有历史上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是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1978年的人均GNI为200美元)上起步的,虽然我们在过去40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世界其它国家也在发展,只不过发展得比我们慢。由于他们的起点高,工业化的历史悠久,我们需要实现赶超仍然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发展上的差距又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供给方,我们可以利用比他们当年发展更加先进的科技和装备、比他们现在更加具有竞争力的生产要素以及其它优越条件来更好地发展生产;而在需求方,由于我国的整体生活水平尤其是物质水平和发展国家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市场已经相对饱和,而我们还有更大的潜在市场需求。我们在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虽然经济体量已经很大,经济增长率也有所放缓,但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这和我们发展阶段上的优势是分不开的。只要我们在这个阶段不断克服发展中的体制障碍和创新障碍,我们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第四是大国优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现由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经历了无数困难,但是我们一旦克服了发展中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我们的大国优势就会表现出来。首先是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优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现代化建设的初期,我们组织和调动了国内外的资源,让局部地区优先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的突破,而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之后,又可以实现产业的梯级转移,带动后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全国经济发

展的有序推进。这种经济发展由平衡到不平衡,再走向平衡的过程,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天然禀赋和独特优势。其次内部发展优势。对很多中小国家而言,经济发展都要受海外市场和资源的制约,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离不开对外开放,但是无论从需求还是从供给而言,内在的潜力都是巨大的,这就使我们能够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相对独立的现代经济体系和内部分工,从而保持内部经济的平稳发展,抵御世界经济的严重波动对我们的冲击。再次总量优势。中国自2009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虽然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好的国家,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目前按汇率法计算的GDP已经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以上。虽然就人均GDP或人均GNI而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作为一个国家而言,中国在组织资源开展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设方面(如发展教育、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国防等),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具有更多的优势。我们可以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首先在局部取得突破,然后再带动全局的发展。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就是这种优势的体现,不仅取得了国防建设的成就,也带动了高科技发展和民用产业的进步,使中国相关领域的发展迅速地进入世界前沿。

第五是传统及文化的优势。中华传统和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建立在个体农耕经济上的传统和文化鼓励人们勤劳、节俭、和睦、创造财富和放眼未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国家富强。它使中国经济和社会保持了长期稳定发展,也是近代社会众多中国人在海外谋生获得发展的优势。从历史上看,直到清朝中后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①。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它历史悠久,也存在着保守的一面,因而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它长期不能适应甚至是阻碍中国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在对待科技进步、制度创新、工业化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等方面,原有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传统观念和工业化进程中所需要的现代观念之间产生了巨大冲突,

^① 1750年中国的GDP总量约为世界的三分之一。参见戴逸《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大大国国力的比较》,载《党建》2008年第12期。

由此导致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和落后。但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伟大复兴的雄心壮志。10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探索实现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建党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逐渐把世界现代文明融入了传统和文化,使传统和文化焕发了生机,并通过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使中国这艘巨轮重新加速,在赶超进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重新回到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这说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一旦和世界现代文明相结合,通过我们的推陈出新,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一点也不亚于西方文明,在现阶段甚至还要更强,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基础。

这些优势是我们实现更好更快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全面建成现代化的特有条件,只要我们抓住时机、利用好这些条件、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完全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三、结论

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十九大提出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分两个阶段全面实现现代化,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我们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道路。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由高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为什么要实现这种转变,我国能否在完成这种转变后继续保持可持续的发展?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后以高速经济增长为特征的我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社会进步,以GDP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实现由高速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第二,不以GDP增长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放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要求,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有机统一。“以人民为中心”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由党的宗旨、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所规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发展的基本方略,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基本矛盾所规定。

第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仍然有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优势,这种优势至少反映在五个方面,即制度优势、创新优势、发展优势、大国优势和文化及传统优势。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分发挥这些优势,我们就能以更好更快的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最终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长远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5年11月23日)[Z].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张立伟)